



张朋园 著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张朋园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 张朋园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ISBN 978-7-80720-796-2

I. 梁… II. 张… III. 梁启超(1873~1929)—思想评论
IV. B25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793 号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 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0-796-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本书撰写期间（1962年7月—1963年6月）
曾获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之资助。
特此志谢。



三十一岁时的梁启超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就思想而言,三十一岁为分水岭:之前,由缓进而激进,之后,由激进而缓和。

再版序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于1964年发表,转眼三十五年,先后曾经两次照相重印。日前本所出版委员会召集人张力先生对我说,该书缺货已久,计划第三次重印。但几次影印的结果,版面字迹多有模糊不清之处,他建议用电脑重新排版,做一些必要的修正,以一个新的版本问世。

我非常感激张先生的建议,藉电脑排版之便,我做了两方面的整理:第一,加强注文,标明页次;第二,校对原文,改正错字。为什么要做这两方面的整理?说起来非常惭愧,三、四十年前的学术界,受外来的影响,已经注意到了学术著作外形的完整,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延续,并不重视资料来源的注释。那时,我们算是年轻的一代,徘徊于进取与保守之间。长一辈的人不下注脚,我们增加了注脚,但我们的注文,力求简略,不像今天的学术界,相关资料均须一一纳入,而且讲究外形上的统一与一致。今天我有改进拙著的机会,如果还是踌躇不前,那就显得太保守了。

为了追寻原文的出处,我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所括引之原文。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过去的校对实在太马虎,错误百出,为之汗颜。经过了这次的核对,错误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我没有改动书中的内容。因为这是我早年的著作,过去的一些观念与我今天的看法大有出入。例如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前思想激进,有志革命。著者在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十分同情他的想

法与做法。后来,任公转变放弃了革命,我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不再憧憬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任公曾说: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他的确是一位先知。中国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人民吃尽了苦头,却没有看见革命家许诺的幸福。这样的感受,如果我要修改本书,恐怕会变成另外一本书。回首我三十五年前的脚步,我决定不改动它。

在此我要感谢所长吕芳上先生、张力先生,给我这个校读旧作的机会。同时也要感谢廖懿姿小姐将原文输入电脑,公小颖小姐在版面上做了精致的设计。

張朋園

1999年6月4日

于台湾南港

萧公权先生序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声名洋溢的人物。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甚至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读过他的文字,并得到启示。然而从民国十八年他逝世到现在三十多年当中,虽有一些论述他的文字,却都比较简略。国外虽有人写了一部专论他与近代中国思想关系的书,[1]但可惜作者不能体会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虽然旁征博引,大放厥词,却不免有捕风捉影、弄巧成拙之感。现在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部二十余万言的书)才第一次把任公 1894 到 1911 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张先生根据可靠的史料(最主要的是千余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及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明:一、任公虽曾受康南海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不为南海所范围;二、在清亡以前任公虽致力于君宪运动,他不能忘情于民权革命;三、他与革命运动虽暂合而终离,但他的言论直接或间接有助于革命思想的发展;四、他在《新民丛报》中攻驳《民报》的文字有助于革命主张之

[1]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更趋于明晰与缜密；五、他与辛亥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他对革命不乏助成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先觉者”。在这些论断当中颇有未经人道的创见。

张先生对于任公与革命运动暂合终离的事实提出了解释。张先生着眼于任公多年所服膺的民权思想，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个人的感情，以及他与康南海的师生关系。从前由于民权思想及政治现状之影响而暂合，后来因感情左右而终离。在大体上这是不错的。但细绎饮冰室遗著，我们可以看出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橥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他主张辨别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绝对，因此他也不坚持个人一时一地的见解必然是正确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清末民初时代的言论家当中他是最富有“民主态度”的一个人。他反对“民之父母”的政治观。民权的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一个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无微不至，纵然使得人人丰衣足食，但因为它阻碍了个人自动自发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 S. Mill)，毋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 J. 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他们的民权观念，因此与任公的民权观念大有分别。这不是说任公的民权观念优于革命家的民权观念。自由主义的民权政治只能在宪政已成的国家里面出现。任公的“民主态度”在中国清季民初的现状之下是不合时宜的。一般人不但不能赞美他虚怀若谷，反要讥笑他反复无常。如果上述的观察尚无大误，那么任公之与革命运动终归分离似乎还有思想上的因素。任公自述其癸卯思想转变的经过说这是不但由于康南海屡加“责备”与“婉劝”，他自己也“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这话是值得注意的。人民国后任公效忠于共和政府，投身于政党政治，倾覆袁世凯的洪宪帝

制,反对康南海的宣统复辟,但到底不与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合流。这虽然由于人事的关系,但不能说全无思想态度上的影响。

张先生这部书的目的是“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经过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其得失。”毫无疑问,张先生已经十足的达成了这个目的。笔者要建议于张先生:希望他续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谊作同样系统的精密的检讨。这一建议必然可以得到本书读者的赞同,更盼望能得到张先生的允诺。

萧公权

1964年3月27日

自序

本书叙述梁任公早期的思想及政治运动,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关心国事起,到三十九岁辛亥革命为止。主文有七章:第一为任公的求变思想,第二为在国内时期的倡导民权及族类言论,第三为流亡日本后的排满论及建立民国的主张,第四为任公与孙中山的合离关系及其在庚子自立军之役中的奔走策划,第五为思想转趋温和的由来与主张立宪的影响,第六为与革命党的论战,第七为任公言论的总述,以统计数字看他的言论影响。此外加上我自己的一点认识与感想,合计共得九章。

我的研究计划原是“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梁任公在辛亥革命之前四五年间为立宪派领导者之一,便以他为人手研究的对象。在阅读材料时,发现任公主张立宪之前,思想一再转变,颇有可述的地方,尤其他的启蒙言论,比之立宪主张更有影响,所以我的探索就往前推进了一步。在进一步阅读中,又发现任公在思想上曾经一度激进,在行动上更想有一番变革的作为。从他办《时务报》开始,中经执教时务学堂而至戊戌维新,他的求变思想,由孕育而成熟,欲求付诸行动。戊戌政变避居日本后,一面继续言论鼓吹,一面与孙中山携手,节节演变,非常引人入胜。

任公的思想与行动,虽然后来转趋温和,但是他与孙中山分合的一段史事,最是动人。我常常假设:如果他们的合作有成,救国的大业或不致因为力量分散而困难重重,辛亥武昌起义说不定要

提早几年,民国初年的历史也许随之改观。

无论如何,这段可歌可泣的史事是值得叙述的。任公的启蒙运动与激进思想有它的价值所在。他转趋温和之后的思想亦有其影响。由于这几方面的探索,材料不断增加,竟然成了本书,原来的研究计划只好留待他日了。

我所引用的材料,最主要的是任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初刊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收罗在《饮冰室文集》中,虽然有小部分没有收进去,或收进去了而与初刊小有出入。)丁文江先生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又引用了许多与任公同时人的作品,以充实我的内容。

任公在辛亥之前所办的七种报刊杂志,得见者六种,给了我很大的方便。各刊均有其不同的分量和地位,我在借重之余,又一一加以分析,用统计数字来表示其影响力。

本书在阅读材料及撰写过程中,承蒙郭量宇师多方指导,启发鼓励,得益最多。文成之后,又承胡秋原先生赐予核阅,给予几点指示。斯坦福大学教授刘子健先生曾经鼓励我对任公所受进化论的影响多予发挥。谨此并致崇高的敬意与感谢。

我尤当感谢萧公权先生。本书初稿排成后,才有机会送请萧先生赐阅。承其在百忙中来函详加指正,并惠赐序文,使本书增光不少。

再又王聿均先生、王树槐先生、张存武先生、魏廷朝先生都曾提供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李毓澍先生、吕实强先生远在海外,分别代为找到一些手边没有的材料。我的同窗老友黄养志先生曾为本书精校一通,改正若干错误。谨并志铭谢。

因为作者学识谫陋,且匆匆在年余中完成本书,难免有遗漏舛误之处,尚望先进学者不吝赐教。

张朋园序于台湾南港

1964年4月5日

本书印行以来,谬承学界奖许,售罄已久。兹将原书再版影印,除改正印刷上之错误外,内容及参考书目略有删订,附增引得一节。惟因影印不容多所更动,且整体之修正费时,故大体亦仍其旧。

张朋园

1969年2月

目 录

梁启超像	1
再版序	1
萧公权先生序	1
自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7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7
二、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	19
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鼓吹革命——梁启超戊戌之前的 激进言论与志气	31
一、明倡民权	31
二、隐言族类	43
第三章 新民、破坏、革命——梁启超流亡日本前期的 革命言论	53
一、排满以兴民权	53
二、破坏以建民国	68
第四章 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	79
一、孙梁始合而终离	79
二、自筹革命起义	92

第五章 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的言行	107
一、言论转变的由来	107
二、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116
第六章 他山之石——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	137
一、论战迷要	137
二、开明专制与约法训政	154
三、土地国有与国计民生	161
第七章 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 影响	168
一、《中外公报》	169
二、《时务报》	170
三、《清议报》	182
四、《新民丛报》	191
五、《新小说》	202
六、《政论》	206
七、《国风报》	207
结论	213
梁启超大事年表(清季)	221
译名对照表	224
参考书目	226

绪 论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两代,自二十二岁时(甲午年)开始关心国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国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择取任何一点,都可以累辞数万,编著成书。但简单归纳起来,可以说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者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他实与革命有过一段因缘。至于他在思想界的影响,任公的著述,估计不下千数百万言,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言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响,就当时的环境及他个人而言,有几种必然的因素。当时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来,一二百年的演变,民权政治的思想,已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进化论影响,与民权政治同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中国受这三种思想撞击最厉害的,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直是一本惨痛的历史。中国到了求变的时代,就等待求变的人物来推动而已。任公便是求变的人物,